

● 大学书屋·词鉴赏系列

# 一蓑烟雨任平生

## 苏轼精品词鉴赏

张旭泉  
编著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大学书屋·词鉴赏系列

# 一蓑烟雨任平生

——  
苏轼精品词鉴赏

张旭泉  
编著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兼烟雨任平生——苏轼精品词鉴赏/张旭泉编著.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8. 3

(大学书屋·词鉴赏系列)

ISBN 7-5611-1326-9

I. —… II. 张… III. 苏轼-宋词-鉴赏 IV. 1207.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5647 号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连市凌水河 邮政编码 116024)

大连业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 119 千字 印张: 6.75

印数: 1—5000 册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 杰

责任校对: 孙 玲

封面设计: 孙宝福

---

定价: 6.80 元

## 序 言

词，源起于隋代，发展定型于中晚唐，至宋而大盛，遂成为有宋一代的文学标志，与前朝之唐诗、后世之元曲鼎足而三，成为我国古典格律诗三座高峰之一，闻名中外，是“诗国”桂冠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词，由于她与音乐的密切关系，人们曾称她为曲、曲子、曲词和曲子词。清人宋翔凤在《乐府余论》中说：“以文写之则为词，以声度之则为曲。”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说：“词曲本不相离，惟词以文言，曲以声音耳。”这些看法既说明了词与音乐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又说明了人们由于着眼于文词或音乐之不同，而产生了称谓的差异。

由于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尽管词发展到后来脱离了音乐而独立存在，但音乐方面的要求始终存在于词的创作中，只不过大大削弱了而已），决定了词与诗的区别和特点。其主要者有：第一，每首词都有自己的词调（即所谓词牌），以表示这首词在音乐方面的特定声情；每首词调，都是“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即每个词调是有一定的乐句组成的，每个乐句又是有一定的字数组成的，每个字又是有一定的声调的，应平应仄，有些还要分阴阳、四声，都有严格而严密的规定，不能随意更

动。第二，除小令短曲之外，大多数词都分片，一般以分上下两片者居多，但少数的长调慢词，有三片甚至四片的。片，也可称为遍、段，都是演奏音乐的单位，后人则用来称谓词的分段。第三，每个词调押韵的位置都有严格的规定，一般来说，词中的韵位大都是音乐上稍作停顿的地方。由于各个词调在音乐节奏上的差别，停顿的地方自然也就存在着差别，不像律诗、绝句只是偶数句押韵那样整齐划一，因而词的韵位的疏密、位置，每个词调都有各自的规定。第四，词的句式大多都是长短句，这也是由音乐决定的。乐曲有轻重缓急，文词则与之适应有一字句、二字句、三字句乃至多字句，并以长短参差不齐的句式与之相适应。

从上面简单的说明中，可以知道词在音乐上亦即是格律上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这些严格要求并非追求形式主义，“戴着枷锁跳舞”。恰恰相反，也正由于有了这些，词才具有了独特的情意美、语言美和音乐美，她的这些本色，赢得了更多的读者，千百年来令人倾倒不已。如果没有这些限制和要求，恐怕也就不会有“词”这个文学样式了。一种文学样式，如果没有其固定的形式，这种文学样式也就不能存在了。我有一个久埋心底的想法：对中华民族这一伟大创造，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不能让她失传，而且应该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方法之一就是：在文科院校中开设一门诗词格律的必修课，使文科学生懂得诗词的

基本格律，提倡有兴趣者写作；在非文科院校中开设一门诗词格律的选修课，听凭爱好者选学和练习写作，从而使这一文学瑰宝不至于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丧失。

诗词相较，前人以“诗庄词媚”来概括，可谓得之。“庄”，来之“诗言志”的传统，“媚”，来之“词言情”的传统，可说各有千秋，不应互相排斥和强分轩轻。“庄”有“庄”的特点，“媚”有“媚”的长处，都可获得读者的喜爱。一般说来，词往往拥有更多的读者，究其原因，我觉得其中主要的一点，即是词的“媚”。惟其“媚”，她的形象塑造才更加鲜明突出，她的语言才更加华丽优美，她的意境才更具有个性……也就是说，词具有更强的感染力。词的创作史已经证明，“以诗为词”，在词作中加入更多的议论，或更多地板起面孔说话，是并不成功的。这也给我们另一个方面的启示，即在欣赏词的时候，不论是对婉约词，还是豪放词（明人张綖谓婉约词“蕴藉”，豪放词“恢宏”——见《诗馀图谱》），都应注意词的本身特点，去把握她的感情发展变化的脉络，如此才读得进去，读得深入。

词发展到中晚唐以后，尤其到了宋代，即名家辈出，佳作如云。这套小丛书，选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几家，有婉约词，有豪放词，有才子词，也有才女词，可谓泱泱词作宝库中的精华。编写体例上，也力求深入浅出，以利于青年读者沿波讨源，在轻松愉悦的欣赏中能有更多的收

获。

本书编著者张旭泉同志，读硕士研究生时，师从著名诗人、教育家公木先生，专攻中国古典诗词，学养丰厚。从事高等教育工作之后，十余年来一直在中国古典诗文这块沃土上耕耘，焚膏继晷，学业日进，教学之余，遂用数年时间，写成这套丛书。我与旭泉同志同处一个教研室，又从事同一专业，时时互相切磋观摩，深知他学有根柢，对他此举，深表赞同。出版社不以我老惫，邀我审读这套丛书，期铅刀供一割之用，因得先睹为快。在补苴罅漏之暇，写了如上的一些无关宏旨的话，不足名之为“序”，聊作开场锣鼓吧！

**曲振泰**

1997年10月于大连

# 前言

“词曲为文字中尤物”，有人这样说。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千年的岁月如流水一般淘洗着尘世的泥沙，留下那些岩礁般傲然挺立的生命：李煜、苏轼、秦观、李清照。

他们的词篇将为此作证。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必须承认，时隔千年，有些什么是大大不同了，这世界变化之快令人瞠目结舌；还有些什么却一如既往，毫无变化——我们依旧是这块土地上黑眼睛、黄皮肤的一群，我们还在这里生活着，还在这里爱着，我们也还有着同样的幸福或不幸福的理由。

托尔斯泰说：“所有的不幸都是爱的不幸。”透过纷纭杂沓的人生万象，千年词章里反反复复诉说的只是两个字：真与爱。

真与爱是词的魂，是词能够划过千年长夜击穿我们心灵的那道电光。一部词史就是爱不断走向真实的历史。词原本是流行于民间的诗体，从《敦煌曲子词》的粗朴吟唱，到苏轼、辛弃疾的举首浩歌，长于表达男女之情的词始而被正统文人拒之门外，继而是他们偷偷摸摸地创制，最后终于登堂入室，公然与诗分庭抗礼，蔚为一代文学大



观，这固然是词对正统诗歌的胜利，更是真实人性的胜利。

惟真与爱才不可抗拒。谁拒绝它们，谁便是在画地自狱。

当然，真与爱之外，我们所不能忘记的还有美，那专属于词的美。音律的美，意境的美，语言的美。美得令人心醉，却又不可言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这是另一种永恒。

李煜、苏轼、秦观、李清照等词人给我们留下的其实就只有这三个字：真、爱、美。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还有必要重温他们词章的缘由。

谨以此书献给爱词的朋友，并敬请斧正。

编者

1997年11月

## 小 传

苏轼(1036~1101),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他是北宋文坛巨擘,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全才人物,诗、词、文章、书法、绘画以至学术上均有很高的造诣。

苏轼出身于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祖父苏序喜欢写诗,有作品一千多首。两位伯父苏澹、苏涣都致力于举业。苏涣在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进士及第,在眉州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从京城西归时,“乡人嗟叹,观者塞途”,当地学风为之一振。苏轼的父亲苏洵,字允明,号老泉,虽然一生未仕,文章却驰名天下,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深受《孟子》、《荀子》、《战国策》的影响,文笔纵横恣肆,波澜壮阔,语言简洁苍劲,有汉唐风韵。当时的文坛宗主欧阳修曾将他推荐给朝廷,召他进京就试策论,他辞不赴试。苏轼的母亲程氏是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颇通文墨。

苏轼弟兄姊妹六人,长兄景先及长姊、次姊都早夭。最小的姐姐八娘自幼便才智出众,能诗能文,十六岁时嫁给舅舅程潜之子程正辅为妻,备受虐待,过门两年就郁郁而终。同胞之中最后只剩下他与弟弟苏辙两人。

八岁时,苏轼就读于眉山天庆观北极院中

的乡塾，由眉山道士张易简执教。童年苏轼勤学好问，关心世事。一个偶然的机，他从老师的口中知道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名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年之后，苏轼和弟弟一起被父亲送到眉山城西寿昌院州学教授刘微之那里读书。刘微之是当地有名的学者，他曾作一首《鹭鹭诗》，其中有“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之句，自以为佳。苏轼见后，认为“逐风斜”没有写出鹭鹭的归宿，不如“雪片落蒹葭”好。刘微之叹赏不已，自认才华不及，说：“吾非若师也。”

少年苏轼的文品、人品深受双亲影响。苏洵常教导苏轼兄弟不要为文而文，认为文章“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工”。强调作文应有感而发，言之有物，不必执着于文法、辞藻的讲究。母亲程氏也时常授书给苏轼兄弟。有一次，她读到《后汉书·范滂传》中范滂临刑与母亲诀别一节时，苏轼从旁问道：如果我成了范滂，母亲赞许吗？程氏答道，你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之母吗？

苏轼的趣好很广，读书作文之外，琴棋书画也十分喜好。琴棋不算高明，书画却颇有成就。他在眉山城西八十里的栖云寺读书时，闲暇之际书“连鳌山”三字于崖上，大如屋宇，雄劲飞动。他的书法后来名列宋四家之首，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苏、黄、米、蔡”。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苏轼十九岁。这一年他同青神(今四川青神)乡贡进士王方之女王弗结婚。王弗聪明而沉静,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常常陪着苏轼读书,“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还能够从旁提醒。夫妻感情十分融洽。

嘉祐元年(1056),苏轼二十一岁。这年三月,苏洵带着苏轼兄弟离开眉山故园,进京应试。他们向北经阆中,穿越秦岭,路过凤翔驿、长安,五月到达汴京,住在兴国寺浴室院。同年九月,苏轼顺利通过举人考试。次年正月,宋仁宗任命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为主考官,国子监直讲梅尧臣负责编排详定等具体事务,举行礼部考试。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在这篇仅六百多字的文章中,苏轼阐明了以仁政治国的思想,主张赏罚分明。文思晓畅,气势非凡。梅尧臣读后,觉得它有“孟轲之风”,把它转给欧阳修。欧阳修阅后,“惊喜以为异人”,准备取这篇文章为第一,却又担心是出自学生曾巩的手笔,为避嫌疑,定为第二名。礼部复试时,苏轼又以“春秋对义”获得第一名。嘉祐二年(1057)三月,仁宗殿试。苏轼、苏辙同科进士及第。这一年,苏轼才二十二岁,苏辙只有十九岁。

应试过后,身为一代文宗的欧阳修对年轻的苏轼大为赏识。他对人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又称赞苏轼“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

下”。欧阳修的知遇之恩令苏轼感佩不已，许多年后他还写诗填词表达自己对欧阳修的怀念。

嘉祐二年(1057)五月，苏洵父子在京城接到消息：苏轼母亲程氏于四月八日病故。父子三人仓皇离京，返家赴丧。居丧期间，苏轼上书给当时镇守成都的龙图阁学士王素，提出自己对蓄兵、赋民等问题的见解，希望王素能深结蜀民之心，使蜀人“安居无事，以养生送死”。

嘉祐四年(1059)十一月，服丧期满，苏轼同父亲、弟弟再次赴京。这一次他们乘舟沿岷江、长江，经三峡，到达江陵，然后陆行北上，经襄阳、许州(今河南许昌)，于次年二月到达京师。途中，父子三人饱览山川景物，咏叹古迹风物，写下大量诗文，汇集为《南行集》。

到京城之后，苏轼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今河南伊阳西)主簿，苏辙被任命为澠池县(今河南澠池)主簿。未及赴任，又经欧阳修的推荐，参加秘阁的制科考试。试前苏轼上二十五篇《进策》，二十五篇《进论》。考试时又作《王者不制夷狄论》、《礼以养人为本论》等六篇政论文，集中体现了他当时的政治主张。结果他以《御试制科策》一篇人为三等，得到仁宗皇帝的赏识。据说仁宗读过苏轼兄弟的制策后曾兴奋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相矣！”从此，苏轼的文章便名满天下，学者多以他的文章为楷模，竞相仿效。

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由于应制科试获

得通过，苏轼改赴大理评事签书凤翔（今陕西凤翔）判官。凤翔是宋朝西北边陲重镇，邻近西夏。在凤翔任上，苏轼针对百姓生活困苦的现状，提出自己“裕民”的主张，力图通过官民矛盾的缓和，来增强抗击西夏的能力。在凤翔期间，苏轼一直关心民众的疾苦。他强烈反对土地兼并。凤翔城北有一座唐末李茂贞的庄园，占地极广，其富丽堂皇关中少见。苏轼见到后，深有感慨，沉痛地写道：“当时夺民田，失业安敢哭？”他到凤翔的第二年，开始建官舍，并在公堂北面建一座亭子。这年春天久旱不雨，到了三月才开始下雨，最初雨小，后来三天大雨，官民十分高兴，为庆贺大雨，苏轼特将这座亭子命名为“喜雨亭”，并作《喜雨亭记》。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正月，苏轼离开凤翔还朝。五月二十八日，他的妻子王弗病逝于京城，时年仅二十七岁，距他们结婚才十一年。她给苏轼留下了一个儿子——苏迈。王弗的去世，给苏轼的心灵带来极大的创伤。遵照父亲的意见，王弗死后，暂时厝灵于京城之西，以待来日葬到母亲程氏的坟旁。

治平三年（1066）四月二十五日，苏洵在京城去世。宋英宗追赠苏洵为光禄寺丞，并命官府备船载苏洵之灵回川安葬。苏轼和弟弟由汴水入淮河，沿江而上，护丧回家。次年八月将苏洵、王弗分别安葬。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七月,苏轼服丧期满。不久,与王弗堂妹二十八娘王闰之结婚。同年十二月,苏轼兄弟离家返京。临行前,将家中的坟垅田宅、洒扫吊祭等事均托付给堂兄苏子明管理。以后,苏轼再也没能回到家乡。

熙宁二年(1069)二月,苏轼和弟弟回到京城。此时,二十一岁的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苏轼因不同意王安石的变法理论,一回朝廷便很快与王安石对立起来。

熙宁三年(1070),苏轼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对王安石变法作全面批评。这引起变法派的极大不满。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奏苏轼,说他借护父丧回川之机,暗贩私盐,并追捕当时船工进行拷问,借以获取罪证。苏轼不屑争辩,自请外放。于是,受命通判杭州。

到了杭州,苏轼迷恋于这里秀美的山水,喜欢这里的风物古迹,并时时遁迹山水之间,吟咏性情,流连光景。此时,他又纳钱塘歌妓朝云为妾。在杭州期间,苏轼目睹了新法在执行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对人民负担的日益沉重深表同情和担忧。杭州一地因违反新法而入狱的人多达一万七千人。苏轼看到囚犯在除夕夜不能回家团圆,而自己又无权暂时放归,心中深感有愧于前贤。杭州近海,水质不佳。唐朝宰相李泌所开凿的著名六口井,那时已不能全用,苏轼便和太守陈述古组织民众整治六井。次年,江浙一带大

旱，各地饮水困难，独杭州不仅饮水有余，还可以水饮牛、洗澡。

三年后，苏轼改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熙宁七年（1074）底，苏轼到达密州。照他自己的说法，这次请求换任，只是想与弟弟离得近些罢了。而实际上，他的心情十分矛盾。他自小“奋厉有当世志”，此时是多么希望能返回朝廷，“致君尧舜”，施展自己的抱负。可是朝廷上激烈的政争，让他不由得寒心而失望，只好远远地避开。就在他知密州的当年，因旧党围攻和新党内部倾轧，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一年之后，王安石又第二次罢相。密州的生活环境相当艰苦。贵为太守，苏轼竟然经常和通守（官名，次于知州）刘廷式一起沿着古城废圃寻找杞菊充饥。密州民困而盗盛，苏轼到任后，一手缉盗，一手“富民”。他奖励捕蝗，减轻赋税，降低盐税，做事概以是否“便于民”为准绳，对新法中有害无利的条目，拒不执行。

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苏轼罢密州任，改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未及到任，又改知徐州。次年四月，他与苏辙同赴徐州。苏辙在徐州住了一百多天，兄弟二人分离多年终于有了这样一次较长时间的聚合。这年中秋刚过，徐州大水。苏轼率军民奋起抗洪，他亲自登城指挥，以城为家，过家门而不入。又令人开凿清冷口，将积水引入黄河故道，最终消除了水患。为防以后



的洪水来袭，苏轼又请求朝廷拨款增筑徐州城堤。竣工后，他命人在东门上建一座大楼，墙上涂以黄土，名叫黄楼，以为纪念。徐州缺柴，苏轼派人在徐州西南白土镇找到了煤，解决了民用燃料匮乏的问题，同时也给冶铁提供了优质燃料，使武器的制作大大进步。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迁知湖州(今浙江吴兴)。四月，他到达这山青水秀的鱼米之乡。湖州本是富庶之地，但连年的饥疫，人口剧减，一片萧条。苏轼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天灾，另一面也是由于实行新法所造成的。正当他准备致力于救灾赈民之举时，厄运降临了。同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朝廷派人逮捕。新党指责苏轼借诗文攻击新法，把他关进御史狱。与苏轼有诗文往来的大臣几十人受到牵连。由于多方营救，加之神宗本来就赏识苏轼的才华，苏轼免于死。当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结案：贬苏轼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史，苏辙、王洙也同受贬斥，司马光等几十人因与苏轼关系密切各罚铜二十斤。这就是北宋时期著名的“乌台诗案”。

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苏轼到达黄州，住在黄州东南的定惠院。团练副史本是无权的闲职，他获罪遭贬，形同流放，不仅没有签书公事的权利，反而处处受到监视。但这也使他从以往的案牍劳累中解脱出来，有充裕的时间沉浸于江山之美中，在政治上失意之后，去寻一份清